

吴文科:以学术研究助推 杂技艺术高水平发展

□本报记者 路斐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步履的不断加快,包括杂技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当代传承与持续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新时代如何推动杂技艺术的高水平发展问题上。在他看来,与中国杂技艺术堪称世界一流的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杂技的学术研究工作却一直比较薄弱,“不仅与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而且还影响着其在当代的深刻传承与繁荣发展”。因此,以“成立杂技研究专门机构推动杂技艺术高水平发展”为题,全国政协委员吴文科在今年的提案中分析阐述了在现有的国家艺术研究专门机构设立杂技研究所的必要性及其意义,认为这将有助于杂技艺术工作者全面继承中华杂技艺术文化传统,肩负起全面发展与深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与担当。

作为历史悠久又传统深厚的表演艺术门类,杂技艺术在我国秦汉时期即已发展成熟。其技艺手段及具体品类包含吊(子)、顶(技)、蹬(技)、耍(花坛)、爬(竿)、转(碟)、走(钢丝)、翻(穿)以及魔术、口技和马戏等。“从我国各个杂技艺术团体及其节目经常在国际杂技艺术比赛、相关专业交流活动中屡获大奖或备受赞誉的不凡成绩可以看出,中国杂技艺术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当今世界位居前列。”吴文科谈到,杂技的艺术特质使其与舞蹈、音乐等艺术样式一样,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等局限的“审美通行性”,拥有直接打通思想与情感而增进人类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特殊功能与便利条件。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杂技的学术研究工作一直比较薄弱,至今在全国范围内都没有一个专门正规的杂技研究学术机构,这一尴尬现状致使当下学术界对于杂技历史和艺术的记录整理与总结传扬,已滞后于杂技艺术的创演实践和文化交流,直接制约了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表演艺术的传承与繁荣。因此他认为,如能在文化和旅游部所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专门的杂技研究所,将有助于改变杂技研究缺乏专门学术机构而影响深度传承的状况,可以为我国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与更加繁荣提供切实的学术支撑。

“近年来国家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杂技的传承保护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何在深刻继承的基础上科学传扬并大力繁荣杂技艺术,仍然有待通过对杂技艺术学术研究的加强,从而更好地提供智力保障和学术支撑,更好地提升传承境界与发展水平。”在吴文科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均为杂技等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是推动建立杂技研究专门机构的重要法理和思想引领。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唯一集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作、非遗保护和智库咨询为一



体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已内设戏曲、美术、音乐、舞蹈、话剧、曲艺、影视、摄影等几乎所有艺术门类研究部门的同时,却唯独缺少杂技专门研究机构,也是一大遗憾。

据吴文科介绍,当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有部分学者已经在从事或兼事着对杂技艺术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并出版过相关著述,该院已具有成立杂技研究所的基本条件,也负有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而深入开展杂技艺术研究的职责任务。在吴文科看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内设的杂技研究所,未来除需增加必要的人员编制和相应经费外,其他所有的相关条件都已具备。成立杂技研究所对于完善该院的学科建制,丰富该院的学术内涵,壮大该院的学术力量,扩大该院的社会影响等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同时,成立杂技研究专门学术机构,也是在新时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要指示的题中应有之义,亟待有关方面切实推动落实。”吴文科说。

刘家成:为剧与城的双向奔赴「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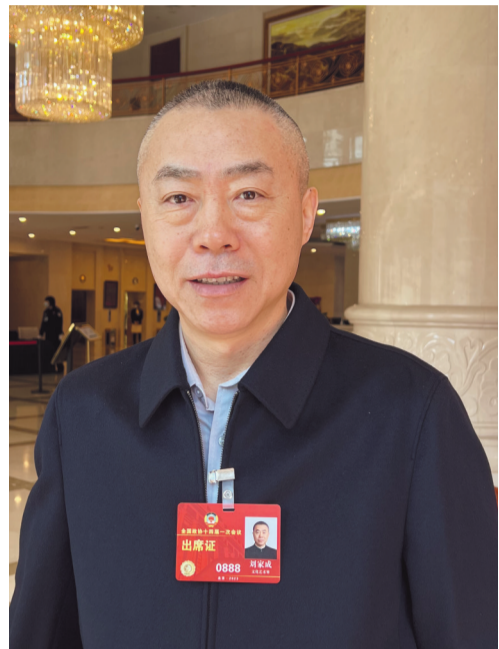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许莹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座城成全一部剧”的经典案例越来越多。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狂飙》中的取景地广东江门历史文化街区,就为该剧增色不少,与此同时,该剧的热播也带火了江门当地的旅游经济。全国政协委员、导演刘家成谈到,地标性场景的合理使用,可以达到影视剧和拍摄地双赢的效果。但现实中,却存在很多实操层面的困难。

“一些企业对行业不了解,觉得影视剧拍摄都不差钱,谈到取景事宜对方便狮子大开口,许多剧组预算达不到,只能望而却步。再有就是影视拍摄团队动辄一两百人,场景地相关负责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索性不予接待。几乎每个剧组都会面临这一问题,借场景是最难的。”刘家成认为,精品影视剧创作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而要打造精品影视剧,就要在场景上精益求精。场景对氛围的营造作用、形象的塑造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有的剧组不惜斥巨资打造专门场景的原因。然而,拍摄反映某个时代、某个地区、某个城市的影视剧,就要有与其相符的场景,否则影视作品的真实性、感染力等都会大打折扣。

如何帮助“剧”与“城”更好实现共赢?今年两会上,刘家成提交了关于制定影视剧协拍准则、提升影视剧质量的提案。在他看来,场景相关单位之所以不愿意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相关依据。“对场景相关单位而言,自己该不该配合拍摄,如何配合拍摄,缺乏政策与规章依据。另外,由于缺乏统一合理的收费标准,使得取景地漫天要价等乱象时有发生。如果能有相关场景协拍规章或准则供参照执行,就会大大降低相关单位配合拍摄的难度、并使协拍单位获得合理收入。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创作更多影视精品力作,助力文化强国建设,也对我国国家形象和地域形象的宣

传和推广大有裨益。”刘家成进一步谈到,影视剧协拍准则应明确以下内容:第一,哪些场景可用于影视剧拍摄,判断标准是什么;第二,如某场景可用于影视剧拍摄,在不影响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前提下,相关单位应提供哪些协拍服务,双方应经过哪些程序;第三,场景协拍方收取费用,应遵循什么样的收费标准;第四,影视剧制作方应履行哪些义务,以保证协拍方的利益不受损失,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不受影响;第五,如场景相关单位不遵守规章准则的规定,有哪些惩戒措施,影视剧制作方可通过哪些渠道寻求帮助。在他看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能考虑到灯光对文物的破坏不允许拍摄,但是像园林等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不会造成破坏的场景,应该在影视协拍准则中有所体现、有所支持。而当准拍场景选取后,需进一步明确权责,例如拍摄方应当管理好剧组等。同时,准则也需要根据场景的重要度等出台官方指导价,从而让大家有章可循。



目前,代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最高水准的“八大美院”的中国画专业招考,仅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专业采取毛笔笔墨考法,其余院校几乎均为以素描、色彩、速写等科目为主的西画考法。有的学校是中国画与绘画专业、戏剧影视美术专业、动画专业、环境设计专业、服装服饰设计专业、工艺美术专业等,统考速写(命题写生)、素描(静物人物写生)及色彩(静物人物写生);有的学校是中国画与油画、版画等同属造型专业,统考色彩(静物)、素描(人物头像)及命题人物组合;有的学校是中国画专业与油画、版画、书籍装帧艺术、插画、水彩、雕塑、摄影等专业,统考色彩、速写及素描;有的学校是中国画专业与油画、版画、雕塑、综合绘画专业,统考素描、创意色彩与速写……在八大美术学院之外,全国其他大大小小的二本、专科美术学院或美术系数以千计,它们的人学考试科目一律为素描、色彩与速写。

中西绘画在思维方式、观察方式、表现语言、材料媒介等方面差异巨大,其人才要求与招考方式本应互不相同以凸显各自的文化特色。然而国内高校中国画专业的招考现实却是,以毛笔为基础绘画工具的中国画招考科目,已完全被“大类招生方式”(以铅笔炭笔及水粉笔为工具,强调西画基本功的素描、色彩、速写三科目)所取代。

这一考试方式导致年轻一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断裂。高考是个指挥棒,美术学院高考科目的设置,直接影响到各类美术考前辅导、培训班的课程设置,无不以素描、色彩、速写为主体课程,以应对未来的美术高考。这既是一种实技训练,更是一种价值观引导。在中学时期就进入考前培训班的年轻学生,在其“三观”形成阶段,就在这种训导下形成对于西画的审美价值认同、对于中国画的情感隔阂,既造成中国画承载的中国式观察方式、认知方式、情感方式及表现方式的传承断裂,也造成中国画专业的优秀生源紧缺、后继乏人,以及中国欣赏群体的严重萎缩。接受了考前班价值训导的考生入学后,在二年限分专业时,首选必是油画等专业,中国画专业几乎无人问津;有的院校甚至要通过做思想工作、抓阄等来维持中国画专业学生人数,这样就无法保证中国画的优秀生源。而这些出于无奈而学习中国画的学生,几乎此前从未拿过毛笔,更不要说用毛笔来画画。另一方面,有绝大多数考前班的学生,最后并未考入专业院校,接受了考前训导的他们未来也将

招考方式及科目设置 优化高校中国画专业

□牛克成



成为西画而不是中国画的欣赏群体。这样,既无院校内高质量生力军的加入,又无院校外欣赏群体的支撑,作为中华文明独特精神标识的中国画的发展前景令人堪忧。日本水墨画自近代以来逐步边缘化的历史与现状,必须引以为戒。

弊端由招考科目设置造成,优化也应从科目调整入手。为此建议:参照书法专业在教育部指导下的单列考试方式,将中国画专业招录进行单列,优化中国画专业考试科目设置,统一采用毛笔笔墨考法,可设临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写生、书法三科目,以考测考生的中国画传统笔墨基本功、笔墨赋形能力及书法基本功。

可在八大美院先行统一试点招考改革,待八大美院统考成熟后,向全国其他设有中国画专业的高校推广,从而建立全国高校中国画专业统考招录机制,提升招考科目对中国画专业必备基础素养的导向效能。并由此辐射到考前培训班,通过临摹、毛笔写生及书法的早期训练,重塑年轻一代的传统文化基因,熟悉中国画工具、媒材,掌握中国画技艺,理解中国画基本原理,参悟中国画文化精神,感受中国画所凝结的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由此形成对于中国画的价值认同及情感亲和,从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中国画的艺术创造者、爱好者及拥护者、赞助者。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

皇甫宜川:落实和加强 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

□本报记者 许莹

今年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第一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深感荣幸的同时,他更觉得肩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政协委员对我来说既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皇甫宜川表示,他会将30多年对电影行业的观察与思考同政协委员的履职工作相结合,做好调研,建言献策。今年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落实和加强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的提案。

皇甫宜川告诉记者,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对中小学影视教育极为重视,并出台相关政策来有效支撑影视教育的工作开展。“201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18年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教基〔2018〕24号),这是一个颇具前瞻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20部委联合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发改社会〔2021〕443号),正式将中小学影视教育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范畴,明确了牵头责任单位、服务标准、支出责任等。”皇甫宜川观察到,近30年来中国影视教育成绩斐然,但由于受到技术欠缺、社会普遍认知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一直无法普惠性地完成这个具有“未来工程”战略性质的任务与目标。两亿多少少年儿童,特别是中小城市、农村和边远山区的孩子不能享受到影视教育所带来的寓教于乐和滋养身心的惠泽,即使在较发达的一线城市,也远未能实现既定目标,普及率还不到10%。当下我国从技术条件到社会认知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为进一步落实和加强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提供了可能。

皇甫宜川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建议进一步优化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会和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工作,关键性的工作要落到实处,特别是要明确其责任与目标,每年有年度报告总结。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会的构成单位,因国家机构改革,部分组成单位职能发生变化,需要做出及时调整;第二,鉴于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在少年儿童电影宣传推广工作中的优势地位,建议加强其在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体系建设



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组织片源、片库建设以及影片解析、影视教育手册、中小学校影视教育教材教法的编制等方面的作用。可以建设一个符合国家数字化要求的影视教育平台,该平台设立后应无条件移交给国家教育部并接受其监管;第三,建议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中小学生影视教育经验交流会,分析得失、交流经验、总结成果;第四,加强地方主管部门对影视教育的责任,建议将影视教育纳入《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中,并将影视教育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当前电影事业快速发展,不同类型的优秀影片为中小学开展影视教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载体。皇甫宜川相信,优质光影艺术的种子必将结出青少年健康向上、社会欣欣向荣的丰硕成果。